

论潮州歌册对梁祝故事的改编

林 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047)

摘 要 潮州歌册《梁山伯祝英台全歌》及《双状元英台仔全歌》对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梁祝故事进行了文学叙事的改写, 并融入潮汕区域特色。潮州歌册起源于明代, 作为独具一格的通俗小说, 歌册在对传说进行改编的过程中, 植入“忠孝节义”的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及劝善惩恶思想, 以达到教化当时的民众(主要是女性)的目的。其以“大团圆”作为故事的结局, 契合了民众的审美追求, 有利于歌册的传播。从改编艺术和创作思想两个层面出发, 可略窥见潮州歌册所彰显的区域民间文学特征及其对潮汕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

关键词 潮州歌册; 梁祝故事; 改编; 民间教化观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00(2019)03-0088-07

潮州歌册是广泛流传于潮汕地区的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 被称为“潮汕妇女的百科全书”^[1], 有着突出的区域及性别文化特质。目前, 关于潮州歌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歌册的传承保护以及歌册与“潮汕女子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如肖少宋^[2]对当前所存歌册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梳理; 刘文菊^[3]立足田野调查, 对潮州歌册的“活态”生存和发展提出建议; 陆小玲^[4]探讨了歌册传承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女性人格的影响; 廖文兰等^[5]重点研究了歌册为什么以及怎样对潮汕妇女产生影响。当前, 关于潮州歌册的整体研究日趋成熟, 但以单篇作品为对象的个案研究不多, 其中关于作品改编的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谭正璧等^[6]认为“改编通行的戏剧和小说”是潮州歌册重要的题材来源。通过对歌册梁祝故事的分析研究, 可以窥见潮州歌册在改编传说故事的过程中对“圣君贤臣”“劝善惩恶”等民间教化观念的接受和对“致中和”的民间文化心理的展现。

一、歌册梁祝故事对传说的改编

梁祝故事作为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在文学、艺术、思想上都具有巨大价值。《梁山伯祝英台全歌》和《双状元英台仔全歌》是根据传统梁祝故事改编而成, 是歌册梁祝故事的典型代表。前者写越州祝英台以“父母之命”许嫁马俊, 务州梁山伯因不得与英台厮守而与其双双化蝶。阎王认为梁祝乃两情相悦, 死有所冤, 遂命以回阳, 完婚成家。之后山伯考中状元, 因为拒绝宰相李立指婚而为李立诬告、迫害, 最终在贤臣冯元礼帮助下识破奸相李立阴谋, 李立被诛, 山伯得封镇国公。《英台仔全歌》接续《梁祝全歌》又作改编, 描写山伯为李立所害, 其子梁承长大考中状元, 历经坎坷并报得父仇。相较于民间传说, 歌册在故事背景、小说主题、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对梁祝故事作了较大程度的改动, 并在小说体裁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彰显了歌册本身独特的区域文学特质。

收稿日期: 2019-04-19

作者简介: 林相(1994-), 男, 安徽舒城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先秦两汉文学。

（一）文学叙事的改写

歌册对传统梁祝故事的改编首先体现为文学叙事上的整体改写，主要涉及故事的背景、主题、情节等几方面。

1. 故事背景的重置。潮州歌册通过梁山伯考中状元的情节，将故事的描写场面转向朝堂，使官场争斗的大背景成为歌册梁祝故事架构之前提。如歌册《双状元英台仔》开门见山，直接将忠臣梁山伯与奸臣李立的矛盾冲突置诸卷首，“再唱李立在京畿，暗恨山伯害不死，反来受封归返员，不觉亦就十年余，想无毒计将伊除。乞伊享了千钟禄，给假回来安乐居。现刻朝中良马无，良马正是防干戈，待我荐伊山东去，买了良马方无虞”^[119]。奸臣李立作为位高权重之宰相，多次加害山伯不成，又推荐其往山东买马，最终山伯因天气酷热而死于买马途中，此是“英台仔”为父报仇之缘由。官场争斗的背景决定了歌册梁祝故事以“忠良”与“奸佞”两派的斗争为线索展开叙事。可见，与传统梁祝故事相比，歌册设置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环境，从而使梁祝故事的主题发生了转向。

2. 故事主题的变异。歌册对于传统故事的改写，在主题上体现了它的变异性。梁祝故事本身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祝英台女扮男装，为的是寻求男女平等，习书学文；敢于违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的是追求真正的爱情，摒弃门当户对、夫贵妻荣的传统婚姻观念，总之，梁祝故事以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的鲜明主题，受到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120]。歌册则以梁祝二人的爱情故事为基础，将“忠”与“奸”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展开叙述。如《英台仔全歌》开篇写道：

“冤冤相报无差迟，梁、李两家伊戴天，苍天若不开皇眼，忠良被害情凄惨。梁孙要报父冤仇，父仇不报恨难休……高中反被奸臣害，险险一命归阴乡。世人勿学恶心机，恶人自有恶人治。从古奸谗无结局，看来良善有团圆。”^[119]

对“忠孝”的颂扬是歌册突出表达的主题之一。“再唱山伯梁状元，指日荣封回家返，光宗耀祖荫妻房，英台夫人好心机，夫妻和顺况好施。苍天不负忠良后，推抹早得麒麟儿，多劝世人得善修，

若遇贫穷当济周，得志当为天下雨，舍去钱银将德留。”^[119]对“善”的极力劝诫是歌册反复吟咏的基调，“褒善贬恶”是歌册故事的另一重要主题。

3. 故事情节的拓展。歌册对梁祝故事的背景与主题上的变动必然带来内容和情节上的拓展和延伸。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梁祝故事——“彩蝶双飞”不过两千来字，而单就《双状元英台仔全歌》来说，其内容就多达十卷，近十万字，大大丰富了原作内容。情节上，原始的梁祝故事止于“梁祝化蝶”，歌册则采用超现实手法，借助传统小说的“入冥”书写，使二人起死回生，完婚成家，化爱情悲剧为团圆喜剧。又以山伯考中状元却为奸人所害，重建故事框架，而山伯之子梁承在各路神仙以及贤臣冯元礼的帮助下报得父仇，则突出了改编故事的玄幻性和忠孝仁义的伦理教化观。

歌册对于梁祝故事背景、主题、情节等的建构、改写，必然触及人物角色设置层面的变动，如梁祝儿女梁承和明月、奸臣李立、忠臣冯元礼以及昏庸皇帝等皆是不见于传统梁祝故事的新造角色。同时，歌册作为潮汕“女性文学”，对女性形象的突出刻画，成为其重要的创作特征。

（二）区域特色的融入

歌册对梁祝故事的改编，充分融入了潮汕区域特色，其以韵文为主的文学体裁样式很好地配合了说唱的文学表达方式。同时，对女性形象的突出刻画，体现了潮州歌册作为“潮汕女书”“闺中文学”的鲜明特色。

1. 独特的体裁样式。潮州歌册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在体裁上，以五言或七言韵文为主，间杂说白；在表现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口头说唱技艺的运用。如《英台仔全歌》写皇上下诏命山伯往山东买马，歌册唱道：“钦差奉命不敢迟，一直就到梁府来。山伯见旨心惊骇，未知旨内凶共吉。焚香接入无放闲，钦差当堂开读明。御史跪落万岁称，钦差一一读知道，声声高读在厅庭。”^[120]歌册中的句子皆为七言韵句，而对于诏令内容等少数不便押韵的地方，则采取说白方式。

“诏曰：尔御史梁山伯给假在家，已经数载，不尝入朝理事。只因国中少欠良马，命卿前往山东

采买良马一千匹，银项就在地方府库支取。”^[120]

歌册在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主题深化等方面的表达皆是通过讲唱韵文来实现的，这种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适应了普通群众的需求。同时“潮汕文化以潮汕方言为内核”^[2]，而潮州歌册作为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以潮汕方言写就的。歌册文中夹杂有大量的潮汕俗字俗语，如“怎么样呢”叫做“做年”，“什么人、什么地方”叫做“值人、值处”，又如“生恁兄妹这二人”“家内并无七亲堂”“恁”“七”等，这些方言俗语的融入，体现了潮汕地方文化与传统故事的有机结合。

歌册在改编传说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对文本进行续编改写，使传说故事在进入歌册后，更加适应说唱形式的需求，彰显了民间文学对底层群众审美趣味的迎合，有利于教化思想的渗透和植入。

2. 对女性形象的突出。潮州歌册素有“潮汕女书”之称，其演唱者和听众主要是潮汕女性。歌册表演有其特有的模式“演唱者将歌册放于眼前，照本宣科，形式简单易于掌握。家庭妇女之间自娱自乐的演唱则更加自由随意，可以一边做手工一边听唱，如果演唱者唱得累了，其他人就会接替下去”^[32]。从受众角度出发，歌册梁祝故事除改变了原作情节简单、人物单一等方面的不足外，在人物塑造上，更加注重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梁山伯祝英台全歌》有这样的情节：番人欲进兵中原，故意献上九曲龙珠宝，若是无人能穿则起兵，最终英台穿之而使番兵退，这一情节以维护国家和平的高度来刻画英台巾帼英雄的形象。又如《英台仔全歌》中梁山伯为奸臣所害，英台孤身寡人，克服艰难，哺子成人，为父报仇，终获团圆等，这一系列情节的展开，皆由英台这一角色来串联，使祝英台直接成为故事的主角人物，这也配合了歌册着重塑造女性形象的创作倾向。再如，歌册写梁承不听母劝，欲进京赶考，代父除奸，英台“听得垂垂啼”，又“大骂梁承不肖儿，敢此忤逆不听母，苦苦害我费心机，望你长成解母忧，不料今日将母丢”^[123]。歌册中的英台既温柔贤惠，又不失刚烈耿直，其形象饱满生动、贴近民众。《英台仔全歌》结尾写道：

“古道无男全靠女，梁家伏祀伊香灯。”^[238]英台独自将儿女抚养长大，并且育之成才，这是对英台能力的褒扬。“古道无男全靠女”一句着重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实非男性可比，强调妇女皆当自强如此，起到很好的教化作用。此外，歌册对英台之女明月的形象的描绘也很突出，“女儿明月美貌清，天姿国色如笔描。挑花刺绣无人强，行年亦有十四岁。从母教诲识文章，女子随母习针织”^[123]。明月不仅长相貌美，其“从母识文章”“随母习针织”是当时潮汕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

吟唱歌册是潮汕女性的一种娱乐活动，而“当音乐被有目的地用来传达特定含义时，它的象征性就开始了扩展。这种象征的扩展性是音乐本身之外的意义，是人们赋予它的”^[9]。歌册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也是如此。古代潮汕女性无学可上，歌册既是女性学习字词、知识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她们的知识架构、文化认同建立的主要依据。歌册更深层次的象征性则表现为民间教化观的植入，即对劝善惩恶思想观念的宣教和对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弘扬。

二、歌册的民间教化观

儒学是中国古代官方意识与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作为“精英之学”存在的。而至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逐渐流行、壮大，平民讲学者大量涌现，儒学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倾向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儒学的正统地位，相反，这种转变通过受到传统儒家思想侵染的文人之笔墨，投射到白话通俗小说之中，反而加速了其世俗化进程”^[33]。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通过世俗化而融入通俗小说，并借通俗小说这一独特的表达样式，扩大了儒学在民间之影响。潮州歌册产生于明代^[1]，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儒学世俗化的关节点，原本属于普通百姓（主要是妇女群众）的歌册故事便成为儒学思想传播的载体，逐步形成一套符契官方儒学思想并渗透于小农阶层的精神世界里的民间教化观。这种民间教化观，将儒家对忠孝贤明、为善勿恶、家庭和睦等社会价值的追求落到实处，其既是当时官方教化思想的具体化，又是对官方教化观某种程度上的补充。

（一）“忠”与“孝”的伦理期待

明清时期，统治者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制度，考取功名成为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潮汕，明代以科举入仕者就约及三千，这些社会现象激起了普通百姓对获取功名的丰富想象，因此，歌册中出现大量的此类情节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期待^[111]。如《灵芝记》《玉钗缘》《韩廷美》《红书剑》等歌册作品，皆以主人公考中状元作为叙事话语模式，从中可见潮州歌册在叙述过程中，对获取功名、光宗耀祖情节的特殊偏好。如歌册《双状元英台仔》中对中举情状的描写：

“梁承文章甚出众，堪择伊身状元儿……状元榜眼共探花，领赐御酒有三杯，三百六十名进士，又赐游街三日回。三人叩头落金偕，金瓜钺斧摆头前，三人俱骑白良马，引动人看闹猜猜。一举成名天下传，威风凛凛人知端。”^[127]

歌册对于中举后的场面的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于中举和仕途的渴望。歌册作者往往深受儒家思想浸染，却未走上科举仕途，他们不仅仅单纯地向往科举入仕，还于此基础上对“君臣”“父子”之道进行说教。

首先是对“圣君贤臣”的官场政治的期待。作者在创作歌册作品时，对于理想的为君之道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念朕乃是正道君，须学仁政勿学昏”^[136]。歌册唱道：

“都怨昏君听奸臣，枉为国主管万民；君不正来臣茹乱，从古相传道如今。枉伊为君坐帝疆，听信谗言害忠良；太亏俺家遭冤屈，有日江山贼人强。天公无目来容伊，有冤无伸做怎呢？”^[174]

儒家思想强调为政以德，对于君臣观念有着自己的价值标准。歌册也强调施行“仁政”，认为奸佞之臣的作恶和君王的昏庸休戚相关。正因为“君王无道听伊言”，所以导致李立“如今弄权在丹墀”。而当奸臣把持朝纲时，官场风气颓然不振，“再唱李立一奸臣，权把朝纲人无比，害尽文武丧归阴，忠良之家被害亡，君王无道听谗言，一朝权柄归伊手，群臣惊散国内空。文官辞职逃走离，武将被贬逐在边”^[230]。

奸臣当道，蒙蔽君王，致使忠良被冤，朝政昏

暗，其罪当诛。与奸臣李立相对，歌册也塑造了贤臣冯元礼、沈爷等形象，他们为人忠诚，坚决维护朝堂公正，在梁氏父子遇害时，敢于面圣直谏。当梁承将要被行刑之时，冯元礼舍身上奏不成，便以己之子代梁承受刑，显现出凛然大义，是歌册所颂扬的对象。在昏君奸臣当道和忠良贤臣罹难的鲜明对比中，歌册的教化效果得到了加强。

其次，歌册在以官场争斗为背景重构故事时，不仅提出“圣君忠臣”的政治愿景，也同时对儒家之孝道观进行宣教“奴恁年幼事未晓，亏你爹爹遭奸臣。你母苦楚有万端，你爹一身遭含冤。此仇今日不能报，真正亏人亏杀人”^[122]。

歌册中的“孝”正是体现在梁承为父报仇上。《孝经》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12]“孝”是“忠”的基石，孝道训育出孝子，而孝子则又转移此“孝”以事君。在家国同构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事亲孝”与“忠于君”本就是归于一体的。歌册中，梁承报父仇和除奸臣体现了“处家则孝”“出仕则忠”的忠孝两全思想。

（二）“善”与“恶”的道德扬弃

《尚书》里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13]的说法，《周易》里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4]的观点。善恶报应观念本就是儒家思想中固有的一种价值评判体系，它强调民众道德层面的“为善勿恶”。歌册所蕴含的民间教化观体现在对“扬善戒恶”的道德规诫上，表现为忠臣的善有善报和奸佞的恶有恶报。

歌册梁祝故事围绕李立与梁祝夫妇及其子梁承之间的矛盾斗争展开，“梁孙要报父冤仇，父仇不报恨难休，意望高中鸣冤主，昏君无道不自由。李立乃是除人殃，死期未到难主张，高中反被奸臣害，险险一命归阴乡”^[119]。山伯高中状元，因不从奸相李立指婚之事，被李立设计害死，山伯之子梁承因而肩负为父报仇之使命。在梁承锄奸复仇的过程中，善与恶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首先，作为“善”的代表，梁祝夫妇既有“好心机”，又“和顺又好施”。所以歌册唱曰“英台夫妻好善施，不上数载产二儿。先得一男后得女，男女两得喜心机”^[119]。梁祝夫妇因乐善好施、怀有仁心，而得到儿女两全、

家庭美满之好报。在写到科举考试时,歌册写道:“有德之人中金榜,无德场内丧阴司”。能否高中状元,并不在其准备得如何,有德之人才能高中金榜。而梁承之所以能高中状元,正因他是拥有“好德”的忠良之后。而与善人之善德相对,奸臣李立等犯有欺君罔上、残害忠良等诸多恶行。李立因山伯拒绝了其指婚,便欲除掉山伯。“再唱李立在京畿,暗恨山伯害不死,反来受封归返员,不觉亦就十年余,想无毒计将伊除”^[119]。李立故意推荐山伯晷天往山东买马,使山伯中暑而死于途中。李立为了斩草除根,诬陷山伯之子梁承,冯元礼替梁承辩护也被诬陷为“同谋乱党”。而李立最大的恶则表现在通番谋逆上,妄图内外勾结,谋篡皇位。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事来早与来迟”,篇中早已预告李立下场。“奸臣惑主展威风,昧言瞒上假尽忠,有日泄露事败露,难免法场受剑锋”^[158]。另一奸佞严彪,则倚仗其父权势,横行枉法、陷害他人,致使“一府之人尽埋怨”,无人不憎恨他。最后,为善的梁承、冯推皆加官进爵,作恶的李立、严彪都被诛杀。《双状元英台仔》开门见山,“世人勿学恶心机,恶人自有恶人治,从古奸谗无结局,看来良善有团圆”^[119]。其结尾再次重申要为善勿恶,“淡淡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祈,善恶到头终须报,只争来早与来迟”^[238 239]。善有善报,因此“有团圆”,恶奸之人终将不会有好结局。

王阳明^[5]在谈到通俗作品的教化功能时说:“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歌册正是通过善恶两派的斗争展开故事情节,从而传达了“扬善戒恶”的传统价值观,并起到了劝人为善的宣讲教化作用。吴士余^[6 20]说:“小说思维意识的形成取决于特定民族历史的文化构成。在中国,这种文化构成主要是儒学。”儒学中的“行善戒恶”观念对小说影响颇深。歌册对于梁祝故事的改编,自始而终都体现了劝善思想。可见歌册“作为儒学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文学的审美和艺术思维确定了它的基本意向:以人为主题审美对象,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为审美目的的运思趋向和思维图式”^[6 20]。文中反复言说“冤冤相报无差池”,不断提出“良善之

人有结局”,歌册作为通俗讲唱文学,基本上遵循了“善”这一儒学思维指归。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7]。儒典《诗经》教人“温柔敦厚”,屈原词赋教人探求真理,《荷马史诗》教人生活准则,歌册对于忠孝、德善的宣扬,体现的恰恰是文学所固有的淑世功能,是民间文学作品功利性的具体表现。

三、市民审美趣味的积极回应

歌册梁祝故事一改原始传说“梁祝化蝶”的悲戚,代之以善人有好报的团圆结局。如描写“忠义”两全的冯元礼一家,“喜得一家受封赠,安排香案谢青天。兄弟孝顺听爹言,就排香案谢上苍。合家欢喜谢天地,有忠有义名声香。冯家自此大团圆,夫妻好命世间稀。冯推后产生三子,长成个个步丹墀”^[238]。又如描写梁氏家庭:

“祝氏太太寿元长,后来五代同一堂。为善之人天必佑,声名传扬于四方。梁承后来五男儿,又产二女人知机。五男二女皆成器,长成侍主扶帝基。新春夫人产一男,二女贤惠盖世间。从此功名代代有,富贵荣华乞人传。”^[238]

歌册梁祝对传说的改编中虽有奸人害父、辗转报仇等令人揪心的情节,但是故事仍以团圆结局,这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趣味。

首先,团圆的结局契合“中和”思维熏陶下的民众心理期待。郭永勤^[8]认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结构方式“不仅仅指才子佳人小说等婚恋作品中夫妻团圆、男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皇帝赐婚等皆大喜的现实结局,还指借助神仙幻想或佛道威力,为作品中的主要事件、人物找到一个大众所期盼的圆满归宿,以及运用因果报应观念,为悲剧的出现寻找一个能够令读者接受的理由,作家为了让读者能够接受故事结局,总会寻找安慰读者心理的由头。”在歌册《梁山伯祝英台全歌》中,梁祝虽已化蝶成双,阎王因感之于二者姻缘之分,使之回阳。“同归梁家,通知祝家,即为成婚”。在梁、祝两家人的认可下,山伯与英台的爱情也变得“合法化”。如此改编,二人的结合既没有违背传统礼制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满足了观众

寻求中和、圆善的心理期待。后梁山伯虽为李立所诬，却终化险为夷，获封镇国公。在《双状元英台仔》中，山伯被奸人害死，而故事的结尾梁承不仅报得父仇，更是成为“一夫二妇美少年”，英台也得“长寿”之福报，并享尽五代同堂之乐。山伯被害的悲感情节在故事结尾得以补偿，听众紧随剧情而生的或喜或悲的情绪也在故事收尾时得到最终满足。

其次，就文化传统层面而言，中国文化本身是强调伦理道德的，“强烈的伦理道德感使他们不愿承认人生的悲剧。善者遭难在道德家眼里看来是违背正义公理”^{[10] 228}，歌册的作者多是落第文人，“他们一方面拥有去恶扬善、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要重视对传统的维护”^{[10] 228}，而对伦理道德的强调所带来的效果，事实上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审美情趣。

其三，明末社会动乱，自万历后期开始，潮州经历数十年动乱，直到清康熙时平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汕地区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9]。在长期的社会骚乱中，歌册以其特殊的形式予人欢乐，使受众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期待在歌册故事中暂时得到补偿，从故事的圆满结局中寻得暂时的精神安慰，可以暂时逃离现实而获得片刻的安宁。

一方面，歌册的受众期待以喜剧结尾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歌册的创作者也热衷于宣扬积极正面的伦理主题，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促成了歌册的“大团圆”结局。而应当注意的是，歌册的大团圆结局并未陷入才子佳人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而是着重体现了“忠孝节义”和“为善勿恶”的民间教化观念。

歌册以民间传说为改编底本，本身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这种转变本身也体现了文学作品的内在张力。总而言之，歌册作如此改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和对国泰民安的生活愿景的渴望，激发了人们对“忠君贤臣”的理想政治模式的渴望与幻想；其次，儒学的劝善思想影响了歌册的创作思想；其三，对市民心理的回应促使故事结局发生变化。歌册所作的改编，是时代思潮、伦理道德、审美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一方面通过教化构建了当时的潮汕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的潮汕百姓的政治态度、道德准则与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 [1] 时之. 潮州歌册——潮州妇女的百科全书 [N]. 中国文化报, 2001-05-17 (02).
- [2] 肖少宋. 潮州歌册研究 [D]. 广州: 中山大学, 2009.
- [3] 刘文菊. 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研究及传承思考 [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0(5): 10-15.
- [4] 陆小玲. 潮州歌册传承中的女性意识 [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0(3): 17-20.
- [5] 廖文兰, 程海青. 潮州歌册传承与潮汕妇女精神塑造的传播心理研究 [J]. 音乐天地, 2015(10): 35-38.
- [6] 谭正璧, 谭寻. 潮州歌木鱼歌叙录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 [7] 潮州歌册选集 [M]. 薛汕, 整理. 汕头: 汕头群众艺术馆, 1992.
- [8] 梁祝文化大观 [M]. 周静书, 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9] 洛秦. 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 [10] 邱兴跃. 明代儒学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研究——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 [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 [11] 吴奎信. 潮州歌册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 [12] 孝经注疏 [M]. 金良年,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13] 尚书正义 [M]. 黄怀信,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4] 周易 [M]. 杨天才, 张善文,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5] [明]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卷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6] 吴士余. 中国小说思维的文化机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 [1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18] 郭永勤. 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和大团圆思维结构 [J]. 天中学刊, 2018, 33(3): 107-115.
- [19] 黄挺. 潮汕文化源流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f Butterfly Lovers in Chaozhou Songs

LIN 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and “Shuangzhuangyuan Yingtaizai”, the Chaozhou Songs, have rewritten the literary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folklore “the Butterfly Lovers” story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aosha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a unique and popular novel, the Chaozhou Songs i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he legends, embedd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nd persuading the good and punishing the evil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ducating people (mainly female). Its “great reunion” as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fits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aozhou Songs” story. Starting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adapting art and creative thinking,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folk literature highlighted in the Chaozhou Songs.

Key words: Chaozhou Songs; the story of Butterfly Lovers; adaptation; folk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陈达晨)

(上接第 61 页)

A Study on Enterprise Emissions Trad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ased on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WU Ronghua, LIANG Xiaohong

(1.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Accounting Intelligence and Services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Abstract: Emissions tradi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economic means to solve the external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 Fujian. By sorting out the secondary market data of emissions trading by h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volume and price of emissions trading in Fujian Province are rising in a large scale and normalized manner. The industry and nature of buyers and sellers are diversified, th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s large, and the rat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However, the report of the listed company's emissions trading information is not clear, and the disclosure in financial report is also missing. Relevant accounting standards setting bodies,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trading platforms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emissions trad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 words: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profil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责任编辑: 练秀明)